她14岁做童养媳,18岁离婚分家产之后结婚生子过上幸福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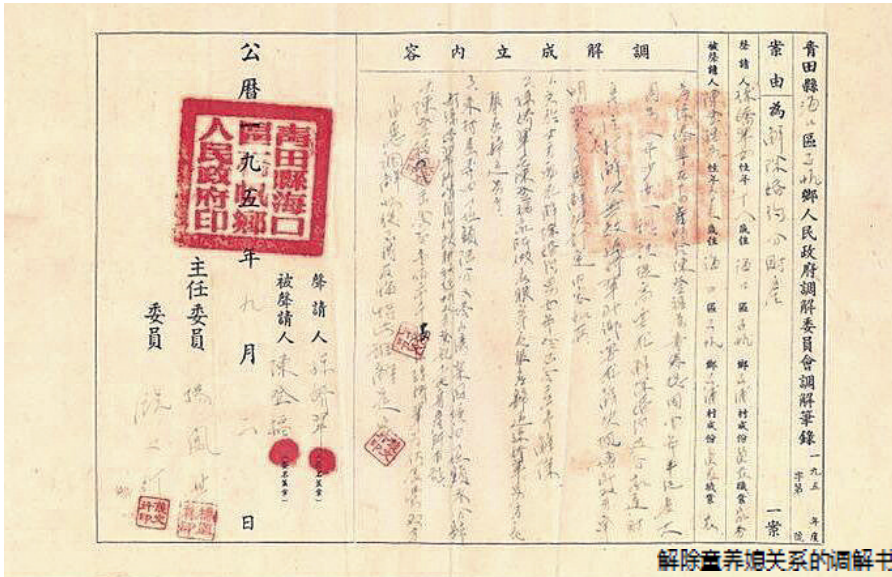
新中国第一部法律明令禁止“重婚、纳妾、童养媳”

孙娇翠与丈夫感情甚笃

本报记者 肖春霞 通讯员 蓝陈嘉

父亲早逝,裹小脚的母亲干不了活,为了活下去,母亲将孙娇翠送给了同村的陈家当童养媳,那一年是1949年,孙娇翠14岁;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明令禁止“重婚、纳妾、童养媳”;1953年,孙娇翠决定与命运抗争,她提出离婚,并要求分家产……要不是当年那纸解除童养媳关系的调解书被台州民间收藏家王文君完好收藏着,这个摆脱旧社会封建婚姻制度束缚的故事也许就消散在历史的烟尘中了。

近日,根据调解书上记载的信息,记者来到青田县腊口镇浮弋村,找到了当事人——今年84岁的孙娇翠,听她讲那“过去的事情”。



解除童养媳关系的调解书

童养媳的日子不好过

14岁那年,孙娇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嫁过去给人家做老婆的。丈夫比她还小2岁,几乎没正眼瞧过她,在孙娇翠眼里,他就是一个有书读、出身比她好的“小鬼”。

童养媳的日子并不好过,家里什么脏活、累活、重活都由她来干。每天烧好饭菜,等夫家人吃完,孙娇翠才能收拾点剩菜剩饭吃。“每天去山上砍柴、放牛,家里还要养猪,都是我来做。”回忆起辛酸往事,孙娇翠抹起了眼泪。

虽然委屈,但至少能吃饱饭,孙娇翠没想过要逃跑。村里不少跟她命运相同的女孩,也都日复一日地过着。

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明令禁止“重婚、纳妾、童养媳”。然而,从未走出过山区,也从没读过书的孙娇翠却对此一无所知。直到1952年,随着这部法律在农村的贯彻普及,青田各个乡镇都建立了民主妇女联合会,有出路的童养媳都跑去离婚了。根据当地县志统计,那一年,青田掀起了离婚高潮,有445名童养媳回去了娘家。

不过,即便如此,那时的孙娇翠依然还是没有勇气提出“离婚”,她担心就算回到娘家也吃不饱饭。

离婚,分家产

1953年的一天,孙娇翠照常在家里干活,无意间听到丈夫的姐姐对公公说:“弟弟以后书读起来,不怕没老婆。不要这个女人在家里,把她赶出去!”听到这话后,倔强的孙娇翠当天就直奔当时的石矾乡政府,找到乡干部,提出“我要离婚”,并要求分家产。

乡干部来找陈家调解。“女人离婚还想分家产,简直是笑话!”陈家不同意。而根据当时的婚姻法规定,离婚时,家庭财产的处理要照顾女方的利益。孙娇翠已经不记得当时乡干部是怎么调解的,但她清楚地记得,她最终分到的家产是:100斤番薯干、100斤稻谷,还有七分田。在调解书上按上大红手印之后,孙娇翠带着番薯干、稻谷,回去了娘家。那一年,她18岁。

当时,那纸调解书上清楚地记载了孙娇翠从当童养媳到解除关系以及分财产的情况,但孙娇翠离开陈家后,就再没见过这张调解书。最后,机缘巧合之下,这张调解书被王文君收藏。

过上幸福生活

恢复自由身的孙娇翠后来有过两次婚姻。前一任丈夫为了多赚钱,跑去宁夏打工,却再也没回来,6年婚姻无疾而终。24岁时,孙娇翠再次嫁人,在这段婚姻里感受到了幸福的滋味。“他一直对我很好,事事和我商量,家务也会帮我一起干”,说这话时,孙娇翠微笑了。

孙娇翠与丈夫生下两儿一女,12年前,丈夫因病离世,她就一直跟着小儿子生活。如今,孙娇翠61岁的大儿子在外做生意,已经当爷爷了;58岁的女儿在家务农,也当外婆了;56岁的小儿子在当地一家混凝土厂上班,就陪在她身边。“现在幸福嘞,我妈妈这么大年纪还自己烧了吃,我们做子女的也很高兴。政府对老人家都很照顾的,养老保险一个月也有2000元。”小儿子黄益和说。

“童养媳”是中国封建时代一种畸形婚姻形态,尤其在农村、山区比较普遍。新中国婚姻法的出台,废止了这一陋习,奠定了新中国婚姻家庭制度的基础。当年,像孙娇翠这样解除童养媳关系的调解书到底有多少张,现已无从考证。但是根据青田县志记载,1952年结合土地改革运动贯彻婚姻法,445名童养媳回娘家、845对青年男女自由结婚、132对青年男女解除包办婚约、503对男女离婚。

青田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常年编纂党史的李振波今年已经75岁了,他还能回忆起当年那些摆脱童养媳枷锁、重新自由恋爱的妇女结婚时的喜庆场面:“那时候兴扭秧歌,男青年扭秧歌,带着一朵花,扭到女方家里,双方情投意合,自然而然地结婚了。”

孙娇翠如今身体硬朗

一天不落,他用照片记录“杭州呼吸”

(上接1版)

可是,坚持做一件事情并不容易。况且,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遇到出差的日子,周建仕就拜托妻儿帮忙拍摄;有时碰巧妻儿也不在杭州,他就想尽办法赶回杭州,“这样的奔波是有点辛苦”。

“不如让更多人来帮忙呀!”妻子的一句话点醒了周建仕。那段时间,网上正流行“随手拍”,将身边的事情记录下来。周建仕决定发动网友一同来拍摄杭州天气,“这样不仅可以解决我有时候不能拍摄的困难,还可以让更多人来关注杭州空气质量”。于是,他在微博、微信中写道:“今天杭州城西的天气如何?有人提供照片吗?”

令周建仕惊喜的是,“召集令”一发出,短时间内就收到了网友们陆续发来的照片,其中还有专业探头拍摄的图片。“原来不仅是我,很多人都在关注杭州的空气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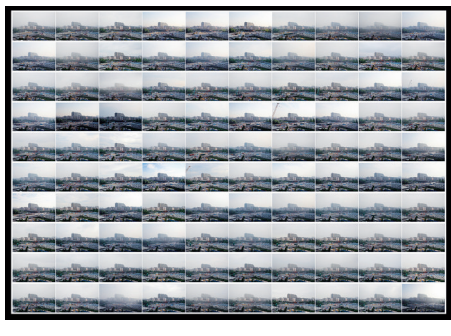
周建仕专门建立了一个杭州空气质量交流群,目前群里共有426名成员。除了打卡记录外,他们还常在群里交流“今天有雾但为什么空气质量却很好”等问题。有些成员离开杭州后,仍然会在群里打卡当地的空气质量,而有的成员会将自己参与防雾霾宣传活动的视频发到群里。

不再“祭”

如今,周建仕的微博粉丝数已经从1000多涨到了1.6万多。网友“君子兰”就是其中一位。“君子兰”是一名装修设计师,对气味极为敏感,“空气质量一差,我就咳嗽。看见周建仕拍摄的《杭州呼吸》后,我就一直在关注。”为了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君子兰”每天都转发周建仕的天气微博,也跟着坚持了5年多时间。偶尔有漏发时,还有网友打趣地问“今天的杭州指数如何?在线等,挺急的。”“现在杭州的空气质量挺好的,我转发的心情也很愉快。”“君子兰”说。

根据杭州市生态环境局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3年,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周建仕作品《杭州空气百日祭》



(GB 3095-2012)评价,杭州市区环境空气优良天数为217天。而2018年,这一数据为269天,比2013年多出了近两个月的天数。

“杭州推行的大气污染防治和机动环保管理措施,我都在关注的。现在绿色出行意识也深入人心,路上新能源牌照的汽车随处可见。以前我出行还经常戴口罩,现在不用啦!”周建仕的抽屉里,还躺着一摞没用完的防霾口罩。在2014年前后,他常常是100只起买,而他上一次购买口罩的记录停留在了2015年3月15日,那次买的50只口罩到现在还有一大半没有用完。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周建仕《杭州呼吸》每日一拍的文案前多了一排字:“为杭州点赞!用摄影见证杭州环境保护。”周建仕说,之前的作品用“祭”这个字是对杭州空气质量的担忧,“现在不用‘祭’,只需‘记’就行了。”

有人问周建仕:“你打算一直记录下去吗?”周建仕回答:“等到杭州空气质量足够好的那一天,我觉得就没有记录的必要了。”